

# 中国观

2015年第11期 总第46期

# CHINA WATCH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 Policy Advice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 目录 | CONTENTS

- 01 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建议调研报告  
/ 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
- 05 中国寻求世界经济新秩序 / 张军
- 07 另类的创新？北欧国家创新体制的构造 / 刘春荣
- 11 金融研究中心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 郑霁光
- 15 “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可实现包容性发  
展 / 潘光、丁云宝
- 19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 赵华胜
- 22 中国“一带一路”落实亟需细节 / 曹辛
- 27 被误读的一带一路 / 葛剑雄
- 35 阿巴边界“黑洞”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消极影  
响 / 姚远梅

##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 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 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夏 梦 Xia Meng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 宇 Fu Yu  
朱红蕊 Zhu Hongrui  
胡唯哲 Hu Weizhe  
沈 郊 Shen Jiao  
张 圆 Zhang Yua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7 楼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The 7th Floor, East Main Building,  
Guanghua Towers,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建议调研报告

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

为了解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会同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于2015年5月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资深教授童兵、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肖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哲学学院副教授吴新文等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访谈。

在访谈中，专家们围绕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在方向上是否有偏差，在方式上是否科学，有哪些领域解读的不够深入，解读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解读的情况，以及如何促进各界更加科学、准确地解读“四个全面”的对策建议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 一、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前各界解读“四个全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其中还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

首先，当前缺少对“四个全面”内在联系、内在逻辑的解读。童兵教授指出，当前理论界对“四个全面”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没有讲清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也是根本保证。现在缺少专题文章把这些关系和逻辑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清晰地阐释。

肖巍教授也指出，“四个全面”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目前的解读没有重点，只是平均地解读四个方面孤立的内容，看似面面俱到，但是缺少对内在联系、内在逻辑的解读。

第二，当前对“四个全面”的一些解读比较空泛，缺少量化指标，对实际工作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童兵教授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现在距离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七年时间了。横向比较，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我们和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尚有差距。之后这几年具体要怎么做，分几步走，现在的解读不是很清楚。

对“全面改革开放”来说，每一个部门、每一条战线，应当改革到什么样的程度，目前没有具体的方向和指标。比如说新闻改革、媒体的融合发展等问题，如果不明确，没有可考核的东西，很容易让一些单位蒙混过关，甚至出现一些假新闻。

对“全面依法治国”而言，对如何依法治理，各个方面应该有更明确的要求。但是目前在新闻界，《新闻法》何时能出台，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都尚不清楚。

在“从严治党”方面，现在贪腐的基本情况到底如何，有多少老虎和苍蝇，具体要治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有明确的答案。总的来说，针对“四个全面”，各界具体要怎么做，相关解读不够。对很多方面，各界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认知。

**第三，当前的一些解读把“四个全面”这个理论拔得过高。**吴新文副教授认为，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才两年多，还未到系统地提出新的理论体系的阶段。“四个全面”是对历史和当下的总结，一些解读把其拔得过高，这不是很合适。“马克思主义”、“中国制度”等是一些大的框架，“四个全面”是其中的一个子部分，要将“四个全面”放在这些大的理论制度框架下去认识和理解。

**第四，当前对“四个全面”的一些解读存在片面化的问题，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吴新文副教授认为，现在很多解读将“四个全面”分开来阐释，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比如有些人讲“全面深化改革”讲得较多，有些人则更多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解读有片面化和局部化倾向。

我们在以前的实际工作中可能更关注某个重点或某个主攻方向，也出现过片面化倾向，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国家治理工作已全面铺开，以前那种片面化的倾向应当避免。所以现在对“四个全面”的解读不应该只突出一个方面，四个方面应该平衡协调。

**第五，当前对“四个全面”的一些解读比较僵化、肤浅。**肖巍教授认为，目前各界对“四个全面”的认识和解读依然停留在口号上，如果只是简单、生硬地进行宣传，很难让大家感受到“四个全面”的真正内涵。

同时，肖巍教授指出，虽然现在的解读、宣传方式都比以前有所改进，不像从前那样搞大规模的运动性宣传，但是宣传系统、舆情系统还是主要从正面的角度去反映现状，而没有反映多样的声音，这样很难使各界对“四个全面”取得深入的理解。

郑长忠教授认为，目前对四个全面的“硬解读”太多，解读的话语放在任何时期都适用，很多解读并没有把“四个全面”放在历史的维度中去把握，这种口号性的解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浅薄的。

**第六，当前对“四个全面”的“可持续性”、对“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作用”、以及“执政方式的转型”等方面的解读还不够深入。**

肖巍教授认为，当前对“四个全面”这一战略布局的解读缺少对其持续性的说明，在领导人换届后，此布局的持续性如何，需要进一步说明。

与此同时，肖巍教授指出，“四个全面”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但是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讲的比较少。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四个全面”怎么讲中国的国际担当、国际影响，需要解读。

此外，肖巍教授还指出，当前面临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变成国家意志的问题。现在我们主张依法治国，同时希望把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但是现在的执政方式，如果没有彻底改变，还是无法改变党治的模式，这样就很难打消人们对“四个全面”能否落实、能否解决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的忧虑。

## 二、正确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当前亟需推出一组专题文章，对“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解读。**童兵教授指出，当下应该专门推出一组文章来讨论“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向全党和广大群众讲明“四个全面”的战略作用。

**第二，结合“四个全面”的提法，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和监督方法。**童兵教授指出，在提出“四个全面”后，中央要进一步抓细抓实，一定要拿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量化的体系、便于监督的指标以及可操作的办法，把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要回归历史，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对“四个全面”进行解读。**郑长忠教授认为，“四个全面”是在“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全面总结和布局，需要将其放在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情境中进行深度解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话语解析的层面。

**第四，在向大众进行宣传讲解时，首先要调动起大众的求知欲，之后引导大众运用理性去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郑长忠教授指出，要使“四个全面”深入大众，首先要将大众的求知欲激发起来，讲一讲为什么要提出“四个全面”，使大众对“四个全面”及其解读感兴趣。之后，再引导大众从理性层面去思考“四个全面”的内涵和逻辑线索。

**第五，有必要对“四个全面”进行明确定位。**吴新文副教授建议，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利用会议等适当时机做一些澄清，讲明“四个全面”这一战略布局并没有替代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回应现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比如“四个全面”要编进教材等。此外，官方还需要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说法来给“四个全面”明确定位，以避免基层误读误解。

**第六，在解读“四个全面”时视野要开阔，多进行跨学科的解读。**吴新文副教授指出，对“四个全面”的解读要结合习总书记的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不能狭隘、孤立地去理解。同时需要进行跨学科解读，不仅是党建专业的专家才可以解读“四个全面”，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应当参与。

**第七，在解读“四个全面”时要更加全面，例如阐述“全面改革开放”时，要注意明确“有改有不改”；在阐述“全面依法治党”**

**时要刚柔并济。**吴新文副教授指出，有些人仅仅强调“要改、要放”，但“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既要放，也要收”，“有改有不改”才是全面的解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好的制度、好的做法要保留，要有所改，也要有所坚持。

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不但要讲反腐，还要讲党的教育和领导。除了刚性的核查办法，也要有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要刚柔并济。

**第八，在对“四个全面”的解读、宣传方面要注重反映多元声音，更好地运用新媒体。**肖巍教授认为，舆情和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注重对各界多元声音的收集，并上报给领导层。同时要加大对新媒体的运用，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四个全面”的宣传效果。



# 中国寻求世界经济新秩序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张军

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越来越多地持不同观点。乐观主义者强调其学习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悲观主义者关注其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高债务与 GDP 比例、出口市场的萎缩和工业产能过剩。但是，双方都忽视中国经济前景更根本的决定因素：世界秩序。

问题很简单：在当前全球秩序中，包括贸易规则中，中国能否保持 GDP 快速增长？或者说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大幅度改变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不过，答案依然不清楚。

中国试图尝试的一种方法是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篮子货币，一篮子货币决定 IMF 储备资产，即特别提款权（SDR）的价值。目前一篮子货币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4 月在上海讲话时，特别提款权的问题是观众提出的主要问题。她认为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的立场得到了媒体的瞩目。但令人遗憾的是，媒体过度解读了她的发言。

上个月在上海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有意给出模糊的回答，他表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将是积极的步骤，但是要实现这一步，需要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取得更多进步

今年十月，IMF 将在其每五年进行的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构成审查中，就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进行投票。但即使与 2010 年的情况不同，即使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得到了大多数赞成票，美国依然可能行使否决权。这样的结果也并不令人意外，考虑到美国阻止了 2010 年达成的增加中国在 IMF 投票权的改革协议，虽然是反对来自美国国会而不是奥巴马政府。

特别提款权的有限使用意味着增加人民币将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但却是强有力的象征，象征着支持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还将让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在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还存在多少发展空间。

迄今为止，空间似乎没有不够。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其 2011 年的书中预测，人民币将在这个十年的后期或下一个十年的早期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根据他的观察，经济和货币主导地位之间的时间差比传统上的认为的时间差更短。如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贸易中最大的参与者，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通过放宽外汇管制条例。然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远低于萨勃拉曼尼亚模型的预测。

其结果是，中国仍然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中国必须跟进，防止资本流出，虽然高利率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鉴于美元在国际交易中占据的垄断地位，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还面临着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国际贸易规则给中国和许多国家间带来了显著的摩擦，其中也包括美国。现在，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这会减少中国不断扩张的出口，增加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壁垒。

显然，中国试图在当前全球体系中开拓出一个适合其经济实力的角色，而且已经面临许多重大挑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的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行动，越来越多地试图根据自身情况重塑世界秩序，尤其是货币和贸易体系。

“一带一路”行动旨在重新打造古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即把货物和思想从亚洲输送到欧洲的道路。鉴于该项目将涉及影响大约50个国家的大量中国投资，其在发展中世界的吸引力并不难揣测。亚投行同样也十分有吸引力，而且吸引力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大国在内的57个国家都已签署作为创始成员国，这可能反映各国不断意识到美国主导的秩序带来的收益在递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现有的全球体系内，持续的国内经济增长似乎不太可能，这是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没有遇到的一个挑战。事实上，唯一遭遇过这一挑战的国家是美国，那是在二战前，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大国。幸运的是，这个先例还算得上适应良好、和平过渡。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消除资源配置扭曲、阻止经济的衰退，中国仍然需要进行重要的国内改革，特别是金融行业改革。当然，中国领导人拒绝采取促进进出口的货币贬值政策，即使代价是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这就表明他们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以确保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不论今年十月人民币是否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全球体系逐步转变以适应中国的进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由英文翻译，出处：[www.project-syndicate.org](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

译者 / 王幼萍

## 另类的创新？ 北欧国家创新体制的构造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哥本哈根） 刘春荣

2015年4月，我应邀访问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并且顺访了一个位于新工厂创意中心的项目“Demola”。这是一个成立于2008年的学生创业网络，致力于通过项目设计把学生的想象力和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公司提供各种辅助性的或替代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个创新孵化器孕育着各种奇思妙想，据了解，每年有450个学生在100个项目中进行团队合作（其中40%是国际学生），80%的项目成果被合作公司纳用，15%的学生被合作公司所录用。

这样的故事并不新奇。在北欧，产学研跨界联动、创意合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心灵习性。从诸如“愤怒的小鸟”这样简单而有趣的游戏，到家居设计、垃圾处理、环境治理，能源再生、北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非同凡响的创意。论及创新能力，各种测量指标和结果各自不同。然而，不管怎么排行，如今的北欧都可以算是全球创新发展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那么，北欧（尤其是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世纪中一跃成为一个具有澎湃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地区的？什么力量催生并支撑了北欧的创新能力？正如其福利体制、政治体制一样，北欧的创新体制的根源和发展动力令当代社会科学家着迷不已。在诸如Demola这样的案例中，也许埋藏着揭开这个谜团的一些线索——比如，跨域合作、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平等包容的文化基因等等。然而，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充分解释北欧的创新能力。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定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教育制度、社会福利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地理因素都塑造了其创新能力和经济的竞争力。

根据熊彼特的说法，“创新”是一种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结合并引入生产体系的活动。“创新”的实践展现于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让创意的灵感、观念成功转换为市场和社会产品，有赖于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创造性配置，也有赖于“知识和价值链”的运作和递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可称之为“创新体制”的一组政策工具、组织制度和规范。系统介绍和分析北欧的国家创新体制和影响因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出一些关键的体制特征，尤其是国家推动的研究委员会及其大型资助机构，正是这些行动主体系统性地驱动了国家得创新活动。

政府介入和制度选择能够定位、彰显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富有创造力的部门。从历史上看，大部分北欧国家都依靠国家的

产业政策和研发投入造就了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支柱行业。瑞典虽然错过了历史上的第一波工业革命，但是在 20 世纪初，它抓住了基于电力和石油的使用所开展的第二波工业革命之契机，发展出了诸如 ABB 和爱立信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富有竞争力的行动者。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所谓“瑞典模式”形成的黄金时期，它的本质是在大型企业、工会和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与伙伴关系。在这个“关键节点”中，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研发投入来驱动经济发展，从而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成为了一项社会政治共识。注重研发的大型企业和知识部门（大学）随之蓬勃发展，它们共同成为瑞典创新体制的支柱。1940 年，瑞典首次成立了“技术研究委员会”（TFR），1968 年代之以“技术发展委员会”（STU）。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技与工业的结合，有效推动大型企业参与国家的技术创新项目，1991 年成立了“国家工业与科技发展委员会”（NUTEK），它以“能力中心计划”这样的大型项目来运营产学研交流网络，创造跨学科的资源集中的研究环境，吸引企业为长期的利益而积极和持久地参与。1995 年，瑞典在 8 所大学建立了 28 个能力中心，研发范畴包括能源交通和环境、生产及生产工艺、生物及生物医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四个领域。能力中心由政府、大学和企业三方共同参与，企业的资源投入要高于政府的投入，包括沃尔沃、爱立信这样的大企业都参与了能力中心的合作。

70 年代以降，这种公私合作、“选择赢家”的策略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和欧盟内部市场发展的挑战，但是倚重公司层面的创新和大学研发能力，其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2001 年，在原来的 NUTEK 的框架基础上，发展出了“瑞典国家创新局”（VINNOVA）这一机制。VINNOVA 不仅支持公司、厂商和大学，而且在政策上也更加倾斜于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2009 年，同样脱胎于 NUTEK 的另一个机制“瑞典经济与区域发展署”也建立了。这些主导机制和一些小规模的创新支持组织一起，充实了瑞典新的国家创新体制。

类似的经验和机制也见诸于其他北欧国家。对于一开始依赖自然资源谋求发展的挪威来说，其创新的发生领域自然有所不同，研发的投入也相对较低，不过，大学依然在其创新体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 1910 年成立的挪威理工学院（NTH，即挪威科技大学的前身）以及一些基于特定产业的学院的形成，给挪威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知识和劳动力技能。为了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46 年成了由工业部主导的“科技研究委员会”（NTNF），这个委员会由数量众多的各种研究机构和“研究委员会”部门所支撑。随着创新主体的增多、研发投入的增强，致力于协调这些机构的机制也发展出来。1993 年开始运作的“挪威研究委员会”（NFR）正是对五个科研委员会（包括工业和科学研究委员会、自然和人文科

学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渔业研究委员会、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进行整合的结果，新的研究委员会挂靠挪威教育、研究和宗教事务部（KUF），下设六个研究委员会，分别负责生物生产和加工、工业和能源、文化及社会、医学和健康、环境和开发、科学和技术领域。NFR 是政府的科研总方针政策战略部门和中央顾问机构，致力于发展和推进挪威的国家科研战略。2004 年，通过合并原有的旅游协会、贸易理事会、工业和地区发展基金以及政府投资者咨询办公室，还成立了“创新挪威”（Innovation Norway）这一组织，籍以更有效地促进全国工业发展，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共同获益。

在丹麦，农产品曾经是经济和出口的支柱。在整个二十世纪，丹麦的经济演化出了许多富有竞争力的部门，包括制药、医疗器械以及环境技术。这个成功的创新故事依然离不开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以及围绕这种投入所形成的组织体制。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领域的早期创新产生了重要的扩散效应。1837 年，在农业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所农学院，随后又演变成各种区域性的“民校”制度（folk high school），为来自于农村的年轻人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技能训练，在全国层面，则发展出了成立于 1856 年的农业大学（2007 并入哥本哈根大学）。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研究委员会体制和知识部门在丹麦的创新活动中的角色极其关键。政府通过“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的建设，把研发资金配置到关键领域，包括食品、生物技术、营养和健康以及环境技术、新材料、信息通讯技术等。1998 年，丹麦成立了统筹各种研究委员会和大学研究活动的研究部，之后又命名为“科学、技术和发展部”。为了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国家对大学进行了新的定位，2003 年的大学法大力倡导新的大学治理形式，强调大学的“第三个使命”，亦即知识转换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与此同时，研究委员会体制在过去的十年间也有较大的重组。新的架构包括若干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委员会、一个“战略研究委员会”以及“科技和创新委员会”。一些功能性的基金，包括 2004 年的“丹麦国家高级技术基金会”以及 2006 年成立的“丹麦增长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创新的平台，前者通过在高科技领域进行风险投资，推动丹麦经济的高科技导向，后者则为区域和地方性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2013 年，主要的政党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通过合并已有的三个组织（科技和创新委员会、战略研究委员会以及先进科技委员会），成立一个大型的“丹麦创新基金会”，这个新的机制拥有自己的独立董事会，预算年度金额计划达到 15 亿丹麦克朗，和瑞典的 VINNOVA 相当。总体上，丹麦的国家创新体制对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注重通过资源整

合、公私互动和市场化来解决知识转换的问题。

芬兰尽管是西方工业化的后来者，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后，芬兰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被誉为欧洲的创新领袖。在创新体制框架中，公共研究组织（PRO）的形成和演化十分关键。二战催生了旨在服务制造业的“芬兰科技研究中心”（VTT），并在战后开发出交通、制造以及能源供应等功能领域，如今它的雇员多达 3000 多名。VTT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知识和服务，号称北欧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在二战以后，大学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并为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芬兰政府十分注重重点领域的选择，在 70 年代催生了电气和电信产业的发展。1983 年，芬兰贸工部成立了“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作为投资于研发的主要国立机构，它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及网络支持，推动企业和科技团体以及制造商、供应商、顾客和终端用户之间的社群合作。TEKES 在协同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实施前瞻性的国家技术计划（时间一般在 5 年左右）和推动产业群的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TEKES 的资助版图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给予企业，其余的三分之一投入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它不仅资助科技创新，也支持福利、设计、商业模式和社会治理的革新。

为了应对越加开放的经济和全球化的挑战，芬兰新一轮的创新体制改革包括对大学进行合并——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通过合并旨在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这一大学在商业、科技和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抱负令人瞩目。此外，为了更长远地提振传统产业（比如林业和金属）、发展能源环境、生物经济、建筑创新和健康等战略领域，国家推动成立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中心”（SHOK），这一非营利组织“执行对未来有长远影响的项目，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突破性的、并且能够催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创新”。

北欧的创新体制具有相当可观的共性和启示，它的发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一个“另类”形态。除了在研究委员会、知识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被福利体制所保障的教育和高度社会流动性以及协作主义的治理结构，也都共同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固然需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情”或“心灵习性”，但是体制选择或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北欧发展经验说明，政府和创新环境的缔造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似乎也说明，某种特征的福利制度和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关系，政府保障越扎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越具有创新能力。



# 金融研究中心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郑霁光

“一带一路”的愿景，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整合沿线国家的市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沿线国家政治合作，推动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有利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实现进一步开放，有利于经济互通互联，科学产业布局，有利于各国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 一、“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仅亚洲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就高达八万亿美金。其中沿线很多国家资源丰富，但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和技术，而中国有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资本积累和发展经验，国内制造业和建筑业积累了不少优质产能，可以拓展到国外市场。“一带一路”的构想为中国和沿线其他国家实现优势互补，提供了一种双赢合作的可能。同时，我国有强烈的对外投资意愿。2014 年，我国对外投资 1400 亿美元，引进外资为 1160 亿美元，首次由外资引进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十八大之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前的“对外开放”转型为更积极主动的“开放对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的沿线参与国家与地区共计 65 个，涉及人口 44 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63%。“一带一路”所涉及国家的总 GDP 约 21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 GDP 的 30% 左右。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设计。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外加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给“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的实现带来许多现实困难。此外丝路沿线国际问题严峻，意识形态各异，价值观不同，法律制度各有不同，信息不对称，信任度不足，都需要投资者做好充分的准备。参与国家的政治不信任，政局不稳定，法制不健全等都会带来潜在的投资风险。这一系列问题在前期的一些海外投资中已经有惨痛的教训。

## 二、中国如何应对“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一) 总结国内经验，做好准备，多方协调合作，谨防盲目跟进

认真总结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 and 成功经验，思考在“一带一路”

## 导读 >>

2015 年 4 月 22 日，国际金融论坛第七期领导人对话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众多精英深入探讨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议题。本文主要探讨“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提出合理的应对机制，并利用上海的经验与优势，加快推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建设。

沿线各国的推广过程中，哪些成功可以复制，哪些教训可以避免。以包容的心态去参与“一带一路”。需要多换位思考，互惠互利。需要正确评估政治风险，分清前后主次，开展双多边合作。

立项需要充分考虑投资回报，考虑市场的可行性，考虑内部需求，考虑风险与收益能否匹配。需要储备高端人才，政府智库与民间智库多进行交流合作。投资前需要做好国别研究，需要政府间的沟通，企业间的沟通。

对于政策制定者，需要提高政策的制定水平，全盘考虑，政出多门，多部门之间协调合作，提高办事效率。

## （二）树立典范，吸引沿线国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沿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想要调动更多国家积极参与整个行动，有成功的案例非常重要。建议先做成功几个示范项目，为参与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又能够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宏伟工程的铺开实施。2015年4月20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发表联合声明，投资建设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与“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复杂的政治局势相比，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可以更多的从经济上、商业上讨论一些项目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力求树立典范。如果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能取得巨大成功，将对其他周边国家起示范作用，能够提升丝路沿线国家的信心，对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 （三）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出现，顺应时代的潮流，是对现有国际投资银行的一个有力补充。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需要一个精益、干净和绿色的高标准；另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需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寻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方略。长远来看，与现有的机构对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均衡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公共政策的讨论等方面，能有效地综合权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观点，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更多更好地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其发展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问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将反映传统金融和新兴市场的金融创新结合，发展开发性金融，提高效率，催动民间资本参与，鼓励国内具有发展优势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走出去，服务于丝路沿线国家的建设。

## （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结合，重视民间资本

在丝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多考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结合，产业战略和商贸战略，多考虑私募和投资私募，引进民间资本，选取有效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合作方式。基础设施的投资多考虑



国际合作，包括其他主权基金，国际商业银行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淡化国家层面的背景有助于缓和政治关系的紧张程度。一方面有益于自身经济发展，金融成熟，企业创新，对外走出去；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风险，降低了因政治原因切断投资的可能性。多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尝试推广公私合营（PPP）模式。通过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降低私营部门对丝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使用杠杆工具通过国有资本撬动民间资本投资“一带一路”。改善民间资本的商业模式。国内的民间资本很多带有急功近利的思维，给海外长期投资和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政府和企业重视。

#### **（五）多种合作模式结合，投资和贸易需要匹配**

考虑多种模式的合作，如经济合作区、投资区、产业园和跨国合作。多考虑使用外国劳动力，多为当地的发展谋求福利，回报当地社会，需求探寻最适合当地发展的道路。招标采购更国际化。建设一定数量的边境合作区，边境产业园。有了贸易投资的带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才会有回报。同时要注意金融服务的效率，避免传统开发投资银行的低效，避免对项目评估进度缓慢的不足，吸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在国内投资的经验教训，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力争在丝路建设的工程审批过程中提供高效的一站式服务的快速通过。

#### **（六）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支持，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会极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拥有密集廉价的人力资源，会严重威胁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及时进行产业转型。“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可能会倒逼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产业素质和效率的提高。企业应该逐渐放弃急功近利的投资模式，注重技术创新，注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发展一批稳定长久、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

#### **（七）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并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近年来国际贸易量总体稳步增长，人民币国际结算量迅速提高，同时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也在逐步推进。近期的许多举措，如推出沪港通，签订一系列人民币的双边结算、互换协议，逐步提高并放开 QFII 和 RQFII 额度限制，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水平，加大了市场化的手段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为人民币尽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的一篮子货币提供了契机，也为实施“一带一路”，进一步走出去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为了与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实现对接，建议在上海建立服务于“一带一路”为主旨的长期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作为对分别以短期拆借、套利为主的伦敦和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补充。“一带一路”将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新常态提供了载体。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来推动人民币市场的发展：（i）重点发展离岸的资本市场，未来条件成熟时，可以并轨离岸和在岸的两个资本市场。（ii）人民币离岸市场以银行为基础，鼓励金融创新，重视风险控制，发挥供应链作用，从国内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范围。

（iii）完整发挥人民币的交易，定价，支付和财富储藏的系统功能，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提高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iv）统合在案与离岸资本的配比，放开货币市场自由进出，逐步放开资本账户自由兑换，逐渐扩大金融衍生品等工具的应用。

#### **（八）关注外来人口来往，发展教育，展现文化软实力**

开放门户带来人员来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会因此放大。参考外来人口为欧洲提供了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开放对外的同时需要警觉外来人口增加给国内带来的多重影响。此外，开放对外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稳步跟进。“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强国家之间的教育，学术交流非常重要。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宣传弘扬中外优秀文化，虚心学习接纳其他文明，有利于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 **（九）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高达 5000 多万人，其中专业人士群体接近 400 万人，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华侨华商人数众多，具有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在所在国政商界人脉广泛，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纽带和参与者。在处理海外事务的时候发挥当地华人华侨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群体对住在国情况的了解，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本身有一定的声望，而且通过一些华人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参与住在国建设，极大提升了海外华人的形象。

此外，国家政策鼓励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住在国落地生根。国家也通过支持建设发展孔子学院和华文学校，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让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子女能有机会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 “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可实现包容性发展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潘光、丁云宝

## 一、将“新丝绸之路”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非本意

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弗雷德·斯塔教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和建议，但斯塔教授指出，美国政府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非他的本意。

斯塔教授说，自己原本提出的是一项旨在联系印度和欧洲、穿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希望能形成一条像原先联系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那样的“新丝绸之路”。他认为，随着西方主导的国际部队逐步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重建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大课题，并且与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南亚、西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他指出，他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就是：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龙”和“小虎”集中的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间、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说，虽然这一构想期望印度发挥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各方力量的参与。

斯塔教授说，他的这一构想得到了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不少国家政府、企业及各界人士的欢迎。阿富汗、印度等国专门开会商议如何参与这个计划，哈萨克斯坦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推进这个计划。但是，在美国政府接过这个计划后，特别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官方人士就“新丝绸之路”发表一系列言论后，该计划似乎成了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谋求地区发展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且明显带有提升印度作用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学者撰文评论“新丝绸之路”计划，认为该计划对中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总体来看对该计划反应消极，但中国官方并未对此明确表态。

斯塔教授说，他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该计划带有牵制中国或排斥中国的色彩，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他认为，在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后，美国和西方应鼓励阿富汗和本地区国家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说，在感觉到中国有反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情绪后，美国有人提出改换这个计划的名称。目前，他感觉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有点犹豫不决，显示出“模糊化”的

## 导读 >>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此后，美国召集相关国家举行了多次会议，积极推动此计划。但在国务卿易人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调门有所降低。通过与美国“新丝绸之路”提出者的对话，作者认为我应利用“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合作互补特点实现中美相互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态势，克里国务卿等人陷于中东乱局，对这个计划似乎也无暇顾及。因此，他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层面下一步将会在这个计划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

## 二、“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

斯塔教授坚持认为，如果排除刻意政治化的因素，“新丝绸之路”构想确实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他预言，不管美国和中国是否参与或支持这一发展进程，经济和贸易层面上的“新丝绸之路”是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因为这有利于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对东亚国家也是好事。他举例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可以解决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为阿富汗提供丰厚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盛产的棉花可以满足印度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可以卖到阿斯塔那、孟买和上海，甚至日本与韩国。

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欧洲、北美、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中亚、南亚、西亚同样可以形成互通互补的跨区域一体化，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今日要构筑的“新丝绸之路”的意义所在。从长远看，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因为此，他虽然不赞成美国谋求主导这一进程，但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否则将失去在该地区存在的时机。他指出，如将这一构想政治化，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导致冲突，使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此，他反对美国将“新丝绸之路”构想抹上浓厚的官方色彩，并将其提升为政府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斯塔教授提到，美国国务院为“新丝绸之路”确定了十多个重点项目，希望拉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参与，但这样做官方色彩太浓，不如让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去运作。他还提出，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大，见效慢，应该增加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民生项目，使人民能从中获益。

斯塔教授解释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把印度的参与作为重点的三大原因。其一，因为有了印度的合作，这个网络才有地区间互补优势，特别是印度能源短缺，但西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的油气管线，对未来阿富汗获得可持续性财政收入非常重要。第二，印度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容的潜力巨大，将是这个计划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关键。第三，印度是“新丝绸之路”计划扩展到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也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斯塔教授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也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新疆的进一步“对西开放”，中国努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的构想，中国向西南开放的云南“桥头堡”战略，西藏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计划等等提供了契机，总体来

看有利于中国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经贸与文化联系。因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计划。

### 三、对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思考

#### 1、美国政府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标

尽管斯塔教授声称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但是，美国政府之所以接过这个构想，就是要达到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欧亚大陆腹地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目前，以美军为主的国际部队基本撤离阿富汗，而中东乱局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使美国不得不投入重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阿富汗的经费投入必然大幅削减，难以扛起阿富汗经济和社会重建乃至“大中亚”地区治理的沉重包袱。然而，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打了十三年，留下了一付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而对这个国家的恢复重建又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出现为美国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将“新丝绸之路”从一个构想提升为战略，并举起这面大旗，就可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的邻近国家、乃至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出钱出力，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协调各方的参与和投入，在阿富汗战后重建和欧亚新一轮发展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 2、美国版“新丝绸之路”战略推行面临两大障碍

尽管美国极力推动，但美国版“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行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安全形势堪忧。塔里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中东的动乱仍将持续，乌克兰冲突愈演愈烈，“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使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团伙再度活跃，南亚印巴对抗和军备竞赛仍然旷日持久，这些都将使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吸引投资不易。目前，深陷危机的欧洲和“安倍经济学”难以为继的日本都有自己的难处，不可能对这个项目投入很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也是刚刚走出危机，财力十分有限；被寄托厚望的印度同样面临重重困难，对投入大笔资金十分谨慎。总体来看，美国试图吸引大量投资的计划难以实现。有专家认为，美国最多能吸引到该计划所需资金的30%—50%。

#### 3、“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并非不能实现两者包容性发展

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斯塔教授多次表示，“一带一路”构想与他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推进，而且可以合作互补。笔者以为，“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必然会有竞争，但两者绝非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

包容性发展。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和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历史上的陆海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单线的，而是多路线的。在科技和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不可能是一条线，而是多线的，并且通过陆路、水路和空中形成立体发展态势。历史上陆海丝绸之路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沿路、沿带地区，因为骆驼、马和帆船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凭借高速铁路和公路、大型航空器、远洋轮船和互联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对整个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乃至全球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延伸作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合作，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与其它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与互补，具有包容性特征，以达到共赢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其它区域合作机制，就包括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也包括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

其次，“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包容性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和中美关系，因此会得到双方的支持。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形势下，中国西部的稳定发展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愈益凸显。因此，就总体来看，美国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并积极推动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发展、特别是西部的稳定发展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国际观察家认为，要实现“新丝绸之路”计划，重在实际投入而非空谈。就经济实力而言，该地区中国最强，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对此，美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同时，美国政府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疲软和财政压力，针对阿富汗和“大中亚”的经济战略也缺乏国内支持，亟需与其他国家合作，因此特别看重中国的态度，这可能就是美国有人因感觉中国的反对情绪而提出改换计划名称的原因。总之，“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合作互补和包容性发展，可使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不但可以增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可使中美在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形成新的合作领域，有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维护周边安全是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这一包容性的、高瞻远瞩的宏观思维，应该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两者关系的指导原则。

#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赵华胜

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有中俄哈吉塔乌6国，今年上合组织很可能将扩大，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此外，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还包括蒙古、伊朗和阿富汗。从成员和地域看，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它们都涵盖了欧亚、中亚、南亚和西亚。在功能上，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部分重合。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三大合作领域之一，其中的内容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两者的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前景，而且也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 一、在外交上，不宜把上合组织定位于附属于或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合组织都由中国提出，都服务于中国的战略利益，都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两者仍有明显区别。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主导的进程，中国有完全的自主决策空间，而上合组织是国际组织，属于各成员国共有，决策取决于集体意志。

虽然中国在上合组织中占有最重要地位，但不能把上合组织定位于附属于或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这在外交上不恰当，不占公理，不能把国际组织定位于服从于其一个成员国的工具，而且这必然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俄罗斯也可依例说上合组织应附属于或服务于欧亚经济联盟。如此，将会比较被动，中俄会产生矛盾，这对上合组织有害，也不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 二、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定位于平行的战略合作关系，各有其独立的地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是在地域和功能上有重合，但没有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是相同的成员，它们在两个框架里也都是合作伙伴，它们自然应该是合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同一批人在做两件事，它们不能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打架。

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关系的恰当定位是战略伙伴，相互支持和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 三、上合组织仍是中国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平台，中国仍应努力推动

### 导读 >>

上合组织在成员、地域和功能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十分相似。因此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前景，而且也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 上合组织发展。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前，上合组织是中国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平台。中国极为重视上合组织，为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不遗余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后，中国既有了新的合作框架，而且它的空间更广阔，行动更自由，这不能不对上合组织原有的地位造成影响。它表现在上合组织已从中国最重要的平台变为最重要的平台之一，而且，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热情高于对上合组织。中国是上合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一旦中国降低对它的定位，上合组织的政治地位及其重要性自然将会无形之中下降。在中国把重点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时，还可能会以上合组织来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相互关系上，这使上合组织处于较低的位置，上合组织发展的动力会减小。

上合组织对中国仍有重要价值。在政治、安全、地区关系、国际影响等方面，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辅相成，它的某些功能也难以被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替代。上合组织的制度性框架也是中国在这一地区重要的外交资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没有的。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同时，中国仍应继续重视和推进上合组织的发展，避免对一方的重视而导致出现对另一方的轻视。

### 四、中国如减少对上合组织的重视，上合组织将为俄罗斯控制和使用。

上合组织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具有了比较稳定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在国际结构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它的地缘政治影响将明显上升，成为覆盖欧亚大陆的庞大地区组织。如果中国降低对上合组织的重视和减少对它的投入，俄印和其他成员国仍将会积极使用这一平台，上合组织将更多体现俄印的意愿，这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损失。

### 五、上合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上合组织在政治上联系着中、俄、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在安全上保证着中国周边的稳定，在经济上推动着区域经济合作，所有这些合作都或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或是直接是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容。因此，生活在发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益无害，在一些方面，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也难以区分。

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会导致出现资源分散的问题。两者在功能上的重合主要是在经济合作领域。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多边合作，而合作的重点又是形成共同的原则和规则。在完成具体的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上，上合组织



有无能为力之感。重大的投资和建设项目主要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中实施。

## 六、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形成功能差异化。

上合组织可考虑进行功能结构的调整。不论从上合组织自身发生的情况看，还是从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适应的需要看，这都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调整的方向是突出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地区关系、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功能。在经济领域，则一方面突出重点领域，集中于有最大共识的多边合作，诸如规则制度建设，国计民生的项目，消贫减灾、环境保护，等等；另一方面上合组织可缩减合作范围，主动放弃一些功能和项目，并可将其转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考虑放弃的功能和项目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证明在上合组织内难以推动的，另一种情况是可能对未来的发展形成制约的，包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会造成制约的。

上合组织部分经济合作功能和项目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转移有可期望的好处。主动的功能调整可使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一定的差别化，上合组织将较少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冲击。同时，这种调整对经济合作能起到激活的作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里，经济合作可有更多自由发展的形式和空间。

## 七、在今年9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可对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做出清晰的阐述。

目前，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给中国的政策制定带来一些问题，也使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有些迷茫，它们不了解中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和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不清楚中国是否还全心支持上合组织的发展。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在上合组织中的合作，也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未知数。建议中国在今年9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对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做出清晰的阐述。

其一，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伙伴关系。

其二，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方向一致，不存在矛盾。

其三，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功能、形式、框架上各有特点，两者可相互促进。上合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也将更有利于上合组织的发展

其四，上合组织作为地区合作组织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其五，中国全力推动上合组织继续发展。

# 中国“一带一路”落实亟需细节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曹辛

在中国举国进入“一带一路”时代后，这一战略的落实情况如何？毛泽东曾说过：“（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同时，抓而不实，也等于白抓。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以欧洲和印度为例，欧洲是“一带一路”北线极其重要的地区和目的地，印度则是南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重要目的地。然而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却是：目前在欧盟国家内部，对中国这一战略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但私下在相当程度上持保留、乃至怀疑的态度；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印度，则另有一番盘算。

“一带一路”进入举国推进阶段后，细节落实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在当前，以下几个问题比较突出，必须予以解决。

## 缺乏有效的国际公关和推介

“一带一路”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而当前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关和推介，这已经成为推进这一战略最大的外部障碍之一。我们从外方对“一带一路”的评论中，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一位欧陆大国官员告诉笔者：“‘一带一路’？还不如叫‘丝绸之路’更清晰，我们欧洲人都知道。”该国官员还向笔者表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是政治考虑更多？还是经济考虑更多？”其疑虑和观望的态度溢于言表，而且显然已经有了初步结论。而另一个欧陆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强国的官员则明确表示：“你们中国在自己的周边搞‘一带一路’，例如在中亚，我们不持异议，但搞到欧洲，我们不赞成、有保留。”

欧洲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他告诉笔者：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总量，而欧洲都是小国，欧洲自然有人会认为这一战略是“明显借经济实力扩大经济乃至政治势力范围”了。而且客观来说，“欧洲自己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也有一个要东扩、要遏制俄罗斯的问题，而你们‘一带一路’的西进路线在越过中亚后，也会进入我们当前正想东扩的欧洲部分，例如那些欧洲的前苏联集团国家……”

近来上述状况有所变化，一些国家在公开场合开始表示要和

国合作，但在欧洲大国里，保留和怀疑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

而印度的官员则表示：“势力均衡”是印度外交最重要的核心，因此印度不可能只把招商引资、解决印度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的宝都压在中国一家身上，而要“均衡”。

上述反映除了利益冲突的客观原因外，也确有对外公关和解释不到位、因而使得这一战略说服力不强、前景不明朗的问题。

从当前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负责与国际社会保持日常密切联系的职能部门，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中联部，都不是经济部门，处于有渠道但不了解情况的状况，这势必影响其推广“一带一路”的效果；而发改委和商务部是经济职能部门，但在同国际社会的联络方面相比外事部门，无论是渠道还是权威性都不够。

还有一个大的根本背景是：国际宣讲的薄弱和缺乏说服力，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的软肋。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公关和说服机会的。例如上述欧陆经济强国的官员在被笔者问及：“（中国扩展到欧洲你们不同意）如果以双方合作合资形式在欧洲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双方共同牟利，你们能否接受？”时，对方官员当即表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印度官员在声称“印度可能是‘一带一路’唯一的麻烦”的同时，也向笔者透露：根据他们的调查，在电力（特别是火力电站）、公路和铁路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同其他外国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比，“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完全不用担心在公开投标中出局。”这显然是一种暗示。

而从目前已经公布“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情况来看，很难看到公关和说服的痕迹。

### 国别调研不够扎实

当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调研不够扎实、深入，而这是确保对当地投资环境有准确判断、从而将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前提。

可当前我们看到的却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呈现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一窝蜂地纷纷开始研究“一带一路”的倾向。仅从中联部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在全国成立多达 59 家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就可以看出这个现象。但扎实细致的国别研究成果则很难看到。

关于因缺乏扎实、深入的国别调研导致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呈现高风险的案例，近年来不断涌现。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在拉美有的国家，中国的大型投资项目不断搁浅，其中多为项目所在国当地政府更迭或外部力量介入引起，造成国有财富的巨大损失。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曾出面协调，但收效不大。

而在近日，浙江宁波又召开了“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但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风险，同样不可小视。在去年9月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论坛”上，与会的中东欧国家外交官和学者在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次会上，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玛丽娅·阿达妮娅介绍说：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出现分化的局面，欧盟急需在欧洲的中东部重新发掘新的发展动力，以改善这一状况。匈牙利驻华大使更是把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说：16个中东欧国家有11个是欧盟成员，6个正处于不同的申请阶段中。更重要的是，16国都十分重视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并把它视为“未来的保障”。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深化和扩大化的前提是，“我们要把这项合作视作中国——欧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而欧盟的态度倒是十分明确：就在去年底李克强总理前往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时，德国驻华使馆给笔者发来邮件说：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和商业行为必须符合欧盟的法律；项目投资必须要履行公开的竞标程序；欧盟对外部门必须全程参与相关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3月已经启动了31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也要以扩大投资来刺激欧盟经济。这和中国“一带一路”有交集吗？还是冲突？

捷克学者福斯特在会上指出：目前16个中东欧国家只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和匈牙利和中国交往频繁，其它国家和中国尚需“增加了解和互信”。

实际上，对当前部分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因欧盟不能给这些国家经济好处而倾向于俄罗斯、中国的“向东方”的态势，欧盟大国对此也有反弹。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如此，调研的扎实和深入与否，直接关乎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安全。例如，当前南海危机对中国落实“海上丝绸之路”的风险有多大？哪些东南亚国家会受其影响？这些都直接关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落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会见昆山素季的启示：在那些政局不稳、或者存在潜在在内外政治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奉行与所在地朝、野同时接触、发展关系的方针，至少不能只顾当朝的，不理在野的，起码不要得罪在野的，这样才能确保投资不打水漂。

既要“一带一路”，“不干涉内政”原则就要与时俱进。

而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据业内人士说：有的国企只顾投资，明知有风险也要上项目。《上海证券报》6月16日报道还说：境外国有资本已超过12万亿，国企管理层腐败导致巨额损失。这是否就是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说的“利益集团影响中国外交”呢？

## 国内已出现“同质化竞争”

今年4月，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表示：“一带一路”不存在哪个省缺席的问题。

虽然号召举国参与，但各地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色，找准自己的定位，有针对性地参与，这才是成功的关键。而现实情况是，相关省份间已经出现同质化竞争。

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西部的陕、甘、宁以及新疆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已经出现“战略定位相似、同质化竞争”问题。

西安市社科院某研究人士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自我定位有重复之处，仅经济带的起点就有重庆、陕西、河南等多个省市争抢。”

而甘肃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则告诉新华社记者：“在资源禀赋相似、市场发育程度相似、缺乏对中亚以及周边政治环境与市场实际研究的条件下，沿线省市选择了近乎雷同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这位教授说：“我们面对同一个境外市场，产业布局重叠的话，可能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他介绍说，西部几个重要城市仍有要政策、要项目的传统思维，在重点任务上，都提出建设能源中心和金融中心，并将落实措施集中为设立自贸区、保税区、论坛永久会址等。

另一位研究人士向新华社介绍说：沿线省区部分项目的同质化竞争已造成资源浪费。丝路沿线现有渝新欧、郑新欧等8条国际货运班列同线竞争，近期安徽也加入竞争，“但班列普遍存在问题，如出境时满载，但返回时严重缺乏货源。有些班列互挖货源墙脚、恶性竞争；有些要政府出价补贴才能维持发展。”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论坛、会议满天飞。

根据新华社的调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陕甘宁及新疆等竞相召开与建设主题相关的论坛和会议，纷纷邀请丝路沿线国家当地政商学界参会参团。陕西、新疆和甘肃都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举办丝绸之路博览会的建议，陕西2013年还提前举办了冠名丝绸之路的国际博览会。

甘肃省贸促会副会长吴丽霞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易给中亚国家造成不良感觉，认为国内之间竞争混乱无序，影响国家形象。”宁夏某政府官员对此表示，新疆、甘肃、宁夏已先后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论坛、亚欧博览会、中国—中亚合作对话等专题论坛，但论坛“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影响力和实际效果不显著”。他说，“目前，在以经济带建设为主题的由政府主导的博览会或论坛上，我国和中亚、中东等地区的签约项目能实实在在落地的寥寥无几。”西部地区的上述现象，东部沿海地区也有。这些现象和模式我们是

如此地熟悉，而且已成为一种顽疾和无奈。然而这个问题不解决，落实“一带一路”就会麻烦不断。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扎扎实实地协调才是。

### 产业和项目对接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实际上，落实“一带一路”最根本的问题是：实现中外产业和项目的对接，并要为这种对接建立一种不仅针对国企，同时也针对民生的有效平台和机制。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是空谈。

这种平台和机制必须围绕下列工作核心进行：切实弄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点城市希望引资发展的产业、经济领域和项目；希望引入的投资额及投资环境和前景等信息，并以合适方式向国内的企业和部门发布。同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要城市提供有意向外发展的各类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意向和相关信息，包括行业、项目和投资额等。在此基础上，促进和帮助中外商业交易。

特别要通过扎实的国别调研，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投资环境等情况，供中方投资者参考，确保中方投资安全。

然而这样的机制和平台，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宁波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博览会”方向正确，但在中国和欧盟达成有效协调之前，中东欧地区无疑是一块投资环境不确定的地方。

而且，我们目前看到国内一窝蜂出现的“一带一路”智库和专家们的研究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现象：谈整体战略者多，谈具体战术者少；谈宏观者多，谈微观者少；谈全局者多，谈局部者少；赞美者多而谈不足并给予完善建议者少。这样的智库和专家，是没有意义、不能信任的。

举国体制，必须和扎扎实实的细节结合起来，则必能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后遗症极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一带一路”刚进入落实阶段不久，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 被误读的一带一路

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当代意义

◎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

◎ 回顾历史不是说中国要去重新控制中亚，而是必须承认，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畅通是以中国对中亚的畅通为保障的。

◎ 经济带的建设，别的国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哪里，对方的油气、棉花贸易不一定要卖给中国。

◎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重要接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哈之间并非没有利益之争，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问题，伊犁河是哈萨克的主要水源，但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

◎ 我们互相不干涉内政，但什么是内政，如果他们的内政影响到了国家利益时，我们应怎么办？

## 导读 >>

葛剑雄系知名历史地理学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教授。本文系根据葛剑雄4月14日在复旦的演讲实录，由覃琴整理而成，略有删节，未经作者审定。本文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演讲原标题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当代意义》。



现在一般讲的“一带一路”路线图

“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路线。对历史不了解或误解，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甚至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如果认真看习近平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就可以发现，他是非常理性，某种程度上是以低姿态，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利益共同体，

而不是有些人在不久前炒作的中国人在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有些人把“一带一路”的成功称为“万国来朝”，这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出现这些有偏差的想法，是因为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

##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 1、“丝绸之路”的概念变化

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现时的概念有很大不同。这是现在一般讲的丝绸之路（如图1）。但实际上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实际上，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内容）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有些确切讲只是交通线路，而不是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道。

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新疆、中亚，或者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

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已经扩展到印度巴基斯坦，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此。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有不少2000多年前的干尸，其中有很多欧洲白种人。再比如，高加索到中亚这一带的人是人类最早驯服马、掌握骑马本领的，这是在3000多年前甚至更早。而在中国内地，汉人的祖先到战国初年才学会骑马。孔子时代，中原的马是用来拉车，而不是骑的，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驭”。学会骑马后，服饰也发生了变化了，高加索一带游牧民族发明裤子。中国考古界也发现，全国最早的裤子是在新疆发现，历史有3000多年。

再如汉传佛教宗教，就是从三条丝绸之路之一传过来的，再从河西走廊传到中原，也有从印度尼泊尔直接传到西藏，就是藏传佛教。阿拉伯势力强大后，伊斯兰教扩展到新疆，整个新疆特别是南疆就皈依伊斯兰教。

有观念认为，新疆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好像是从内地传过去的。这是不对的，有汉族的文化，但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而且往往其影响还在汉族文化传播之前。

这一带跟中原地区的交通早就有了，人类早期是喜欢交往的。证据也有，河南安阳曾经出土过3000多年前的商朝妇好墓，以及其他商朝墓中已经有玉器，经鉴定为和田玉，证明3000多年前已经能把和田玉运到中原甚至更远。比如张骞是陕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导的，证明交往早就有了。

但要称之为“丝绸之路”，是有特殊含义的，涉及到主要贸易手段是什么，存在于哪一阶段。



## 2、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维护动力来自外界

从以上角度，我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我想强调的是，汉朝当时没有（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

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现象。

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打败匈奴，他得到情报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打下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虽然这并不容易，地图上隔了太远的距离。

当张骞到达以后，大夏君主在那儿已经住得很舒服了，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变化，



古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

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但丝绸也不是张骞出使才输出的，实际时间更早。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 China，一种说法是波斯人将中国成为“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 China 读音；第二种说法是与“秦”谐音。至于称瓷器为 China，则是倒过来，因为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可见张骞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经知道中国产瓷了。

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但商品经济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东西有需求。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唯一来源，且丝绸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的高价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价。

但丝绸之路无论从哪条路线都是非常艰苦的，从南面要穿过帕米尔高原，从北面草原则距离更长，而且绕不过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没有导航、机械交通，主要依靠骆驼、牛、马、人力的情况下，代价相当高，没有强劲需求不可能支撑。

### 3、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多人反对，因为会糟蹋良田，换来的是干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开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绿洲、祁连山、稳定水源。中国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也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

而现在不同，我们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主动，但如果没有对方的主动响应，就建不起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互利，不搞零和，建立经济共同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惟一选择。

建设“一带一路”出于中国主动，如何使对方积极响应并能持续，需要有相应的对策。

在商言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考虑怎样使对方有动力，不要认为我们想建就能建成功，而对方一定会感恩戴德。

对方有对方的考虑，例如以前两国要建中哈边贸城，但中国基本建好了，但哈萨克斯坦基本没动。为什么他们积极性低，因为地理原因的限制，对方靠近边界是无人区。这与越南不同。中越就一河之隔，边贸禁都禁不了，跟朝鲜也一样。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理不一样了。经济带的建设，别的国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哪里，对方的油气、棉花贸易不一定要卖给中国。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前提。

## 二、（历史上）中国对中亚的控制是丝绸之路畅通的保障

丝绸之路通少断多，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民间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

公元9世纪以后，海运发达起来，这条“丝绸之路”就多是作为中亚内部交通线了，比如新疆喀什到中亚，而不是从内地到中亚。这个过程往往被忽略。

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新疆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管理困难，因此采取松散的、监护性质的管理，都护就地解决问题。由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利用中央权威的就地监护管理，其中的小国只要每年上报户口，表示服从统治即可。

西汉后期的著名人物陈汤发现，被自己打败的匈奴北单于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于是擅自调动六小国兵力将其消灭。但汉朝有争议，有的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却认为，他假借命令，没有汇报。这反映了汉朝在遥远的西域的困境，对西域的统治仍不稳定。最终对西域的统治只维持到西汉结束，王莽时已经不能维持，西域都护府最终撤掉。

东汉“三通三绝”，此后时断时续。

丝绸之路恢复了三回，又断了三回，而且有时的维持完全靠杰出个人，比如班超，以及西汉留下的威望。但国力无法维持时，朝廷就下令撤退。东汉之后，这条路经常名存实亡。北魏实力强大，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来了中原，但当中原战乱，无暇他顾，正常的贸易、交流又会断掉。只有中原政权能够牢牢控制中亚时，丝绸之路畅通，中国能掌握主动权。

唐朝初年，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控制了锡尔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面到了阿富汗，在西方有个军事行政的中心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很畅通。安史之乱爆发，西域空虚，藏族祖先吐蕃扩张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后，唐朝西界只到今天的甘肃，不可能再控

制西域，早期发达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存在了。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路上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中央内部的交通线了，已经失去了。

明初一度控制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无法控制，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丝绸之路。

海运一通，就更没必要走路上丝绸之路的崇山峻岭了，而且海运不是以丝绸为主，还包括茶叶、香料、瓷器等，这是重大的变革。

### 三、为什么要强调“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我们不要认为，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历史上一直存在畅通的丝绸之路，这也就是习近平强调新疆问题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原因，我们要正视历史问题。

回顾历史不是说中国要去重新控制中亚，而是必须承认，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畅通是以中国对中亚的控制为保障的。中亚的稳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应有相应对策，如美国、俄罗斯的影响，宗教、民族（突厥语系）、水资源等。

中亚是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方向，但我们有必须面对的一些局面。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中亚的影响日益扩大，出兵阿富汗，就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机场，2006年我们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才知道那里的友谊桥就是北约运输物资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比哈萨克斯坦人还多，这是斯大林长期移民的结果。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变化很大，有亲西方的，有以民族独立为主的，有亲俄罗斯的。再如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重要接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哈之间并非没有利益之争，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问题，伊犁河是哈萨克的主要水源，但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中国应该怎样跟纳扎尔巴耶夫之后的哈萨克斯坦保持关系？

我们互相不干涉内政，但什么是内政，如果他们的内政影响了国家利益时，我们应怎么办？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政权更迭，总统更换，执政党更换，如何遵守原来的协议。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则应考虑马六甲海峡、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苏伊士运河、中美洲地峡等。马六甲海峡是我们目前主要的运输通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缅甸的形势很微妙，我们应该回过头想想我们对缅甸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曾想，为什么希拉里是第一个会见昂山素季，中国照理应主动调停昂山素季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话现在局面就不同了。

建设“一带一路”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对这些地方我们应该



采取怎样的方式，怎样在战略上保证中国的利益？

#### 四、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往往有很多误解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海洋观都来自于地中海，但地中海只有一个，非常特殊，基本是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是非常便利的。**中国最接近于地中海的是环渤海地区，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地区交通方便。但中国不具备地中海周边的文明群星灿烂，如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亚速、两河文明等，有多种文明的交汇，文化不断交流。而环渤海地区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岛历史上较为落后，他们学习中国积极性高，但中国学习他们的动力没有，也没有必要。

但海洋不过是载体，海上的航行终点在哪儿，能带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这才是本质。沿线牵涉到什么文化，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看海上丝绸之路。

但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因为中国观念中，海就是边缘，四海之内、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说法都是体现。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这之后的初级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

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取其经验和技術（针路，牵星过洋），目的在宣扬国威，无经济目的，是通过政治活动，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号召沿线小国家到明朝来朝贡。

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是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只想让人来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还比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日本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朝贡不是剥削，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一般情况下，不计较经济效益，只讲政治。

**但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官民嗟怨，而且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这些都是历史教训。**

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如果什么都看成政绩工程，不考虑经济效益，全部依靠政府的、依靠免税政策，而不是依靠民间经济上的交流是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会增加外界对中国的抵制。相反，正常的民间交流、贸易倒是容易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此外，我们还要在文化、民族、宗教上做准备，了解外界的情况。

坦率讲，以前我们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像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珍爱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赏、赞美别人的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同样也很难达到我们的目标。



# 阿巴边界“黑洞”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消极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姚远梅

## 一、阿巴边界黑洞的形成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决定围绕印度发展英帝国。与此同时，英俄大角逐。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印度，英国战略家提议建立印度“科学边界”，即：将传统印度边界从沿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山脚下一线，向山上抬高至战略与军事上“科学”保护印度的地方，分段解决。他们决定先从阿印边界地带实施上述战略。而那些山区，是阿富汗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但遭到普什图人顽强反抗。多次征服不见成效，伦敦决定大规模入侵，以迫使阿富汗国王接受不平等条约而实现目标。1879年，他们发动第二次对阿战争，并顺利迫使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然而，普什图人爆发大规模反英起义，英国陷入困境。为脱离这个困境，英国人决定地图上智取，即：扶植亲英阿富汗国王上台，而后迫使其接受阿印地图边界线，然后再勘界落实。1880年，他们宣布拉赫曼为阿富汗国王，与其结盟。随后，英国一边供养拉赫曼政府，一边勘察地形拟定杜兰德线。一切就绪后，于1893年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藉此，英国战略取得巨大进展。然而，勘界落实时，普什图人再次起义反抗，并得到拉赫曼幕后支持。为平息他们的反英情绪及防止俄国乘虚而入，英国没有更好解决办法，只能多方经济安抚。这时杜兰德线成为烫手山芋，英国人不想放弃，于是设法加强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如成立西北边省（即现在巴方KP省和FATA）、不停签约佐证，以及让巴基斯坦合法继承等。故此，法理上，杜兰德线是阿巴国际边界。

而实际生活中，杜兰德线基本不存在。英国人仅在俾路支人居住区的沙漠和人烟稀少地带完成勘界，而在普什图人居住区，根本没法勘界。不仅如此，西北边省成立后，为平息当地居民的反英情绪，英国人签署协议，答应给予后者高度自治，英国军队及法律不得入内。同时，阿政府与普什图人联合，借此寻求经济援助。巴政府继承杜兰德线后，这种状况基本没变。至今，KP省和FATA，巴军队和法律不得入内。

理论上，杜兰德线是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它几乎不存在。其理论与现实的错位，自然导致阿巴边界产生巨大安全漏洞。形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人居住区烂了个大窟窿，国际法主权主体被理论上的杜兰德线挡在洞外，而普什图人及其“朋友”却不受其约

## 导读 >>

当前，我国提倡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以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在我方逐渐加大投资之时，有必要严加防范陷入阿巴边界黑洞。这一黑洞是当年英国人建立印度“科学边界”遗留下来的，已导致普什图问题产生、苏美阿富汗战争失败和塔利班的兴起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值得我方密切关注。

束，洞内洞外自由穿梭。相应，这一漏洞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加上巴方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她必须关闭再讨论该问题的大门，故这一安全漏洞无法填补，犹如黑洞。

## 二、历史教训

这一黑洞影响深远。首先，普什图问题产生，阿巴边界矛盾不断。英国人撤退时，西北边省普什图人要求全民公决以决定其未来地位：归属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是独立。阿政府予以支持，而英巴竭力反对。普什图人起义反抗巴统治，待后者予以军事打击时，他们越过杜兰德线躲入阿境内，而巴军队则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界而无法越界打击。自然，巴政府指责阿政府为他们提供庇护，而阿政府则反驳说：因为普什图人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由此，棘手的普什图问题产生并影响至今。

其次，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失败和塔利班兴起。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反苏势力迅速越过杜兰德线躲进巴境内普什图人区，并在那里受训和接受外援，而苏联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而无法越界打击。自然，这一黑洞成为庇护反苏势力的天堂。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即在此发展壮大。1982年，苏联已认识到这场战争无法打赢，需要及早撤退。但讨论撤退方案时，他们再次发现：阿巴边界问题成为其顺利撤退的主要障碍。因为阿方优先维护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牵涉杜兰德线，需要巴政府参与进来，而阿巴根本不可能就此和谈；同时，美国不支持苏联及早撤退，继续通过巴政府支持塔利班拖住苏联。打不赢撤不走，莫斯科只得深陷战争泥潭。1986年，苏联已被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大嚷：“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1989年，苏联选择完全撤出阿富汗，而阿巴黑洞则完整遗留。

美国阿富汗战争，黑洞再次爆发威力。尽管相关档案尚未解密，但从战争发展轨迹来看，美国几乎重蹈苏联覆辙。黑洞成为庇护反美势力（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天堂。为此，奥巴马政府制定阿巴战略，欲跨境打击，但由于阿巴政府不予配合，这一战略终告流产。不仅如此，美巴结盟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普什图人为主体）时，原本棘手的普什图问题得到激活，反巴势力在黑洞中成长，即巴基斯坦塔利班。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需要撤退。讨论撤退方案时，也面临当年苏联的困境，故外界看到一轮轮阿巴和谈。2014年，美国选择不完全撤退，即：经济支持阿富汗战后重建，保持一定驻阿美军。不知是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



边界问题，故此，黑洞再次完整遗留。

### 三、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

美国从阿富汗撤退后，我方提倡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以带动“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发展。至此，历史出现巧合：当年英国人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的主要区域，成为当今中巴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无疑，阿巴边界黑洞将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巴境内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的“西线”“东线”之争，可见一斑。KP省和俾路支省坚持“西线”，但对我方而言，它太不安全。巴政府对他们实际控制力很弱，如果境外势力煽动当地民众起义反抗我方，我方将被动落入陷阱。因为黑洞是庇护他们的天堂。我方倾向“东线”，但遭到上述两省的反对。后者已放言：如果放弃“西线”，中巴经济走廊难见光明。如果我方坚持“东线”，无疑将引起他们的不满，境外势力会趁机煽动他们的反巴情绪。届时，我方选择不外乎这些：

(1) 中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2) 支持巴政府打击分离主义势力；(3) 经济安抚。第一种选择，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失败。第二种选择是无底洞，因为历史已一再证明阿巴黑洞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如果境外势力给予他们援助，我方不得不重蹈苏美覆辙，只是阿巴角色对换而已。第三种选择也是无底洞，因为我方需要同时经济安抚阿巴两国政府和人民，并且出价要超过竞争对手，否则，麻烦不断。

鉴于此，趁诸多项目尚未运行之际，建议我方：(1) 从原始档案出发，加大对阿巴地区的研究。切不可被外在的阿巴国际边界所迷惑，实际生活中，阿巴是连体兄弟，且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再者，阿巴都是国际政治中讨价还价高手，善于在大国博弈中谋好处，我方要汲取英俄美的经验教训。(2) 要展开阿巴边界问题的调研，搞清楚巴政府控制其边境的实际情况。(3) 深入了解美国阿巴政策趋向，谨防前者给我方挖坑。(4) 倘若研究调查发现中巴经济走廊极具风险，我方应有预备方案。切不可将错就错，酿成更大灾难。在此国际秩序变动重要时期，我方应尽可能未雨绸缪，少犯错误。

# 《中国观》2015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上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每月下月刊以“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收录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centrems@fudan.edu.cn](mailto:centrems@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夏梦

联系电话：021-5566 5501

电子邮件：[centrems@fudan.edu.cn](mailto:centrems@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703室

邮编：200433



##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